

# 中国研究在英国的发展与现状： 从马可·波罗到孔夫子 <<

理查德·桑德斯<sup>①</sup>

## 一、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500多年来，英国和欧洲国家都对充满异国风情的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兴趣始于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在中国的旅行经历。马可·波罗 1271 年 17 岁时随父亲和叔父开始穿越大半个亚洲来中国旅行，行程 1.5 万英里，历时 24 年。这期间他在中国居住了至少 17 年之久。<sup>②</sup> 不幸的是，马可·波罗 1295 年返回威尼斯时，正值这个城邦国家和热那亚处于交战之中。他被关押了 4 年，于 1299 年获释。在这段囚禁岁月中，他花了很多时

---

① 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nders）的文章由王展鹏、黄洋翻译。

② 关于马可·波罗的故事可参阅史景迁（Jonathon Spence）所著《大汗之国》，该书资料丰富、颇有趣味但又不乏怀疑精神。参见 Jonathon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8, Chapter 1。

间向一位来自意大利比萨、名叫鲁斯蒂谦的狱友口述自己的冒险经历。鲁斯蒂谦融合了许多自身的见闻、经历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知识，以手稿的形式写出了《马可·波罗游记》（下称《游记》），或称《寰宇记》<sup>①</sup>。《游记》（经常被称为《百万见闻录》，因为马可·波罗经常在游记中用“数以百万计”来描述他在中国见到的事物）的不同版本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但无法断定确定无疑的权威版本），为欧洲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远东诸国生活的全面记述，其中无疑也包括了作者游历中亚、印度和日本的叙述。马可·波罗叙述故事的才能卓越，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这些国家的风貌，但其笔下最生动的画卷，还要数中国，在那里他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对其最为了解。

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前（大约 1272 年至 1275 年间），蒙古人与中国宋朝的战争已近尾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最终打败南宋，于 1279 年在中国全境范围内建立了元朝。这个王朝的统治延续了近 90 年。1275 年，马可·波罗终于抵达了忽必烈汗的宫廷，他受到欢迎，开始了为皇帝效劳的 17 年生涯。其间，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访问了中国包括云南在内的许多边远省份并一度担任扬州的行政长官。马可·波罗对大汗在大都（今北京）的宫殿的描述，与对中国人口和贸易的描述一道构成了其作品中最丰富多彩和最负盛名的部分，使欧洲各国的旅行者和冒险家为之兴奋。（200 年后，克里斯多弗·哥伦布怀揣一本《游记》，开始了发现“新世界”的航程）然而，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大汗治下的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和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其中还包括烧煤和纸币的使用——在欧洲人看来这些可以证明了当时在中国存在更发达的文明。<sup>②</sup>

虽然马可·波罗的冒险故事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激励着其他人步其后尘来到中国，但没有人知识的交流和对中国的理解方面能与之媲美。在其后的明

---

① 古腾堡项目（Project Gutenberg）目前正开展将全四卷的《马可·波罗游记》上网的工作，供读者免费下载。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可使用。

② 怀疑者们也许会对弗朗西斯·伍德的有趣著作《马可·波罗去了中国吗？》（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Westfield, 1998）感兴趣。身为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弗朗西斯·伍德在该书中提出，马可·波罗可能从未到过黑海以东的地区，几乎不可能访问过中国。

代和清朝初年，中国对欧洲而言变得更加遥远，更加与西方隔绝，充斥着一种带有文化优越论色彩的“文化主义”思潮<sup>①</sup>，视外国人为低等民族，与蛮夷无异，并将与外国的贸易及其他形式的交流视作异端，认为其毫无必要。因而，东西方间的交流日益式微。其结果是直到英国凭借 18、19 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加变得更加自信、无所畏惧，才重新找回对中国的兴趣。这一兴趣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一方面，福音派基督徒们认识到中国人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这为他们传播信仰、“拯救灵魂”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政治家们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进行贸易，使英国商人可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 二、传教士

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CMS）<sup>②</sup> 成立于 1799 年，1807 年向中国派出了首位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众多新教教会与宗教组织的传教士步其后尘从英国和美国来到中国。一些人认为，这一运动促成了西方关于中国的严肃学术研究的第一次大发展（这类研究，特别是在美国，通常被称为汉学）。来中国的传教士们不仅热衷于了解这个国家，并且由于其在中国的经历，成为最有资格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传播开来的载体。事实上，名叫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 1804—1843）的英国传教士或许是对此类中国研究（包括其语言、历史和民族<sup>③</sup> 等领

---

① 关于“文化主义”在中国的含义及“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请阅读 Chen Zhimin（陈志敏），“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Issue 42, February 2005。

② 见英国圣公会差会网站。

③ 关于塞缪尔·基德生平和工作的全面叙述，请参阅《英国名人大辞典》中关于“塞缪尔·基德”的条目。参见 H. C. G. Matthew, “Samuel Kidd (1804-1843)”,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009 年网络版）。

域)影响最大的一位。塞缪尔·基德曾任位于马六甲的英华学院院长,致力于帮助当时在英国殖民地定居的众多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工作。他1837年回到英国,被任命为英国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教授,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1841年,基德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或关于中国人符号、哲学、古物、风俗、迷信、法律、政府、教育及文学的论述》一书。该书可能是此类书籍中出版最早的一部,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方方面面的叙述,涉及语言、文明、历史和文化等层面。<sup>①</sup>

随后来中国的其他基督教士还有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sup>②</sup>理雅各出生于苏格兰,1839年被英国圣公会差会派往中国。他与之前的塞缪尔·基德一样,担任了马六甲英华学院院长,直至学院1842年迁往香港。之后的25年他一直居住在香港,1873年才回到英国永久定居,随之受聘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并于1876年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理雅各写作并出版了大量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孔子和其他关于中国经史子集作者的论著。他对儒家经典和其他经典文本的批判性翻译,至今还被视为标准参考书籍。但他的成果对当代的中国社会研究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这一点格外令人遗憾,因为他在中国时就曾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见下文)。

不甘落后的剑桥大学于1888年设立了该校的第一个中文教席,首位任教者是威妥玛爵士(Sir Frances Wade)。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也是第一位未担任过传教士的中文教授。剑桥的第二位中文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威妥玛一道创造了被称为威氏拼音的音译系统。在现行汉语拼音使用之前,威妥玛拼音一直是将汉语音译为英语的唯一标准。

---

<sup>①</sup> Samuel Kidd, *China*, Taylor and Walton, 1841. 令人惊讶的是该书可在谷歌电子书中全文下载。

<sup>②</sup> 读者可以在《传教士和学者理雅各》一书中阅读到理雅各的生平和工作情况: H.E.Legg, *James Legg,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 三、英国的经济扩张

如前文所述，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人对中国产生兴趣的第二个动机是打开同中国贸易的大门。作为英王乔治三世的代表，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Cartney）于1793年访问中国并觐见乾隆皇帝，试图说服乾隆皇帝同意减少对英国贸易的限制，并为英国商人（马戛尔尼使团）谋取其他利益，从而推进中英贸易。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之后数年间其他怀有类似目的的使团也都无功而返。<sup>①</sup>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鼓励向中国出口鸦片：商贩们从该公司位于印度北部的工厂购买鸦片销往中国，获取高额利润，导致中国鸦片泛滥。19世纪初清政府希望阻止国内鸦片消费的迅速蔓延，当道光皇帝采取激烈措施禁止鸦片贸易并于1838年终止鸦片进口时，英国不甘心被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派出了战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最终导致19世纪中国被迫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古代中国及其哲学家、宗教、文学和语言的兴趣迅速上升。可以说，人们对当时中国的了解或多或少是通过傲慢的军事征服者和经济帝国主义者获得的。这一情形直至20世纪初并未根本改变。英国学术界乃至决策者和中国事务观察家们对发生在20世纪20—40年代的国共内战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译者注）期间中国人所经历的艰苦斗争的了解，也并非来自于本国学者，而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sup>②</sup>

---

① 读者可以在《传教士和学者理雅各》一书中阅读到理雅各的生平和工作情况：H.E.Legg, *James Legg,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Jonathon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8, Chapter 3.

② 埃德加·斯诺（1902—1972）或许是支持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最著名的西方记者，也是他们的密友。他是美国人，长期为《中国评论周刊》撰稿，从1932年起常驻北京，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两次赴延安拜访毛泽东。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西行漫记》，该书193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斯诺可能是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持同情立场的最重要作者。他去世后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

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sup>①</sup>笔下的描述。

## 四、新中国时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开始了另一段与西方隔绝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操纵新成立的联合国承认蒋介石偏居台湾的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当时，中国几乎不和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联系与交流。中国与外国投资者来往甚少，几乎不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仅仅为获得宝贵的外汇和进口物资才被迫进行有限的贸易活动。虽然西方国家如英国仍在北京保留领事馆，但其外交官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

## 五、李约瑟

然而，正是在这段中国研究看似不大可能取得突破的时期，一位英国学者——李约瑟<sup>②</sup>开始了他的中国研究工作，取得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作为一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工作时，遇到了三位在剑桥做研究的年轻中国学者。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探索意识令李约瑟产生了共鸣，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学习（并掌握）了中文，还于1942年受皇家学会

---

<sup>①</sup>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医生和共产党员。20世纪30年代，他同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作战，在战地输血技术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白求恩1938年来到中国，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在八路军驻地从事医疗工作。1939年，他因为战士做手术感染败血症，同年在华逝世。

<sup>②</sup> 西蒙·温彻斯特所著的《炸弹、书籍和罗盘》是一部广受欢迎的李约瑟传记：Simon Winchester, *Bomb, Book and Compass*, Harper, 2008。

的委派远赴重庆，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并担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科学顾问。他埋头于有关中国科学的各种记载，并在当时和随后的几十年间遍访中国各地寻找第一手资料，获得了对中国古老技术的独特理解。正是李约瑟告诉西方人，许多伟大的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冶铁、铁犁、发条装置和罗盘都源于中国。他关注的重点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13、14世纪（即马可·波罗访问中国时）在科技方面遥遥领先，却在现代被西方全面超越？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他遇到了周恩来，并得到后者的鼓励。事实上，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及朝鲜战争期间在朝担任观察员时的行为，特别是发布据称美军使用生物武器的报告书，使之在西方陷入了诸多是非与争议之中。之后多年李约瑟一直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

1946年离华归国后，李约瑟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事实上，据说是他坚持在该组织的名称中加入“科学”一词）。1948年李约瑟回到剑桥大学凯斯学院，在那里开始了或许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独自一人取得的最伟大成就”的研究工作。他原计划就中国科学史撰写一本小部头的著作。然而，一卷接着一卷，最终完成了16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首卷出版于1954年。正如他的讣告作者在《独立报》上所称：“通过认真详细、系统的叙述，中国2500多年的成就得以展现，涵盖数学和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动植物学、水力学、冶金学、航海科学、纺织、卫生和医药……20世纪没有哪一部学术著作能像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那样，为改变过去的既有观点做出如此大的贡献……李约瑟的非凡天赋是以下几类才能的完美结合：语言能力——他精通8门语言，包括3种古代语言；化学、技术和工程方面的才能；一种思维特质，凭此他能将无数的细节融合成一幅跨越大约1500年、囊括世界范围各种发展的画卷，清晰且令人信服。”<sup>①</sup>

李约瑟将其所有文章汇集于剑桥大学，最终在1987年剑桥大学为纪念他的工作成就在一幢新建的专用大楼里成立了李约瑟研究所，专门从事东亚科学

---

<sup>①</sup> 见《独立报》刊载曼塞尔·戴维斯教授所写的讣告：Mansel Davies, *The Independent*, 27 March 1995。

史研究。该研究所至今仍见证着英国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如今它也是一家独立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研究、出版和其他服务，促进人们对中、日、朝、韩人民对人类科技文化的历史贡献有更广泛的理解”。李约瑟研究所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全球性研究中心，拥有东亚科学、技术和医药方面独一无二的藏书和其他出版物，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研究机会，并举办各种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定期发表通讯。虽然李约瑟已于1995年3月以94岁高龄去世，但他的成就和天才贡献仍然通过以他命名的研究所在剑桥大学传承着。<sup>①</sup>

## 六、新中国成立前英国高等教育中区域研究的诞生

直到距今不远的现代时期，英国大多数学术研究都是与古老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联系在一起。两所大学都建于13世纪初。15世纪和16世纪，苏格兰建立了一批大学（包括圣安德鲁斯大学、阿伯丁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然而，在英格兰，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前，高等教育机构几乎没有发展。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在位时间颇长的一位君主，1837年即位，1901年去世。英国大学的第一波新发展大多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及其前后完成的，主要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迅速发展的那些城市中。有趣的是，这些大学中最早建立的是诺丁汉大学，它于1798年获得了皇家特许状。之后，许多在英国高等教育中享有盛誉的大学建立并获得了皇家特许状，其中包括伦敦大学学院（1826年）、利兹大学（1831年）、伦敦大学（1836年）、杜伦大学（1837年）、曼彻斯特大学（1851年）、埃克塞特大学（185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895年）、伯明翰大学（1900年），布里斯托大学（1909年）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1916年）。这其中许多大学的声望、校舍和学生数目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迅速发展，并作为“红砖大学”而为人所知，

<sup>①</sup> 见李约瑟研究所网站。



这一称谓至今还被频繁提及。

然而，尽管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英国已拥有了许多大学，并且数目在不断增加，但对中国问题和中文，特别是对“新中国”的兴趣和研究只局限于寥寥几所大学。如前文所述，19 世纪末之前，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教席。尽管这些古老的大学保持了对古代中国哲学、帝国历史及语言文学方面的兴趣，但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却存在巨大空白，特别是对一个有着完全陌生形式的政府和社会体制并由共产党治理的国家（对英国人而言）更是如此。亚非学院（SOAS）首先承认并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该学院（严格说来是伦敦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英国第一所在学术研究体系方面未基于传统“学科”，而是按现在人们所说的“区域研究”加以组织的大学。亚非学院 20 世纪 50 年代末决定创办《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CQ）是其致力于该地区研究的最重要步骤。该季刊第一卷于 1960 年出版，迅速成为所有中国观察家的必读刊物，特别是对那些希望了解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到底在发生了什么事的人更是如此。

## 七、《中国季刊》的短暂偏轨

《中国季刊》<sup>①</sup> 最初几卷出版时正值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目录页上的内容读起来是颇引人关注的。确实，只需通过《中国季刊》的目录，学术界人士，无论是教师、研究员还是学生乃至“中国观察家”们，就能大致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毕竟，那时在中国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由非中国籍人士编辑的此类出版物。这并不令人吃惊。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变得越来越与西方隔绝。如同想要同中国开展贸易或投资的英国公司一样，英国记者、学界人士和评论家访问中国同样不受欢迎。一个例外是英国的二战英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蒙蒂”）。他应毛泽东的邀请于 1961

---

① 早期出版的《中国季刊》目前已可通过互联网全文下载。

年访华，受到了铺红地毯迎接的礼遇。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会谈后，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高度赞扬中国。<sup>①</sup> 另一个例外是令人尊敬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琼·罗宾逊。她于1967年访问中国并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状况，其观点发表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sup>②</sup>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一书中。罗宾逊教授凭借上海的得天独厚位置和当地领导提供的材料，对中国的情况作了相当正面的描述，尽管其中不乏迟疑与不确定。她的描述较之其后中国的许多改革者的观点而言对“文革”持有更多肯定态度，这使其后来饱受其他知识分子的批评，称她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尽管这可能有失公允。<sup>③</sup>

在20世纪60年代狂热的气氛和冷战的大环境下，主要国家的安全机构积极参与搜集思想观点、资助学术研究的工作，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季刊》发现自身在早期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来自文化自由基金会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 的资助。这是一家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的掩护机构。此事1967年被《壁垒》(Ramparts) 杂志曝光后，主流媒体也相继做了报道。<sup>④</sup> 《中国季刊》的首位编辑马若德 (Roderick Mac Farquhar) 最终证实了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一事，但他坚决否认在担任编辑期间知悉此事。他还在2006年写给《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的信中，坚称自己在编辑

---

① 2010年8月22日，迈克尔·谢里登 (Michael Sheridan)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一篇题为《信件透露毛泽东和蒙蒂相互推崇》的文中写道：“新近出版的信件表明，《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蒙哥马利子爵赞扬中国革命并预言到2010年中国将有光明的未来的文章后，毛泽东请他的妻子也阅读该报。”

② Joan Robins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nguin Books, 1969.

③ 大卫·卡特的著作《同行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提到了琼·罗宾逊。与她一同列入这一名单的不乏著名人士——李约瑟也名列其中。参见 David Cauter, *Fellow Traveller's: The Intellectual Friends of Communism*, MacMillan, 1973.

④ 文化自由基金会是一个1950年成立的从事反共宣传的团体。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泛滥的顶峰，其意欲消除政府、媒体、艺术界、娱乐业及工会中的所有左翼人士。文化自由基金会资助英国的《遇见》杂志一事1967年被《纽约时报》披露，证实该刊接受了中情局的资助。同年，《壁垒》杂志又披露该基金会也曾资助《中国季刊》。

工作中做到了严守中立和保持独立性。<sup>①</sup> 在冷战的狂热氛围中，特别是在中国内部如此神秘而外人掌握的“信息”很少的情况下，人们确实难以对学者撰写的文章做出鉴别。准确的信息、真正的学术研究与背景复杂的宣传二者之间的明确界线何在呢？这一问题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众多争议并不足为奇。

毫无疑问，《中国季刊》经历了早期资助丑闻后，其地位和重要性仍不断加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负责该刊的出版。今天，研究中国的学者和观察家们普遍将其视为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研究的重要国际学术刊物，即便不是最杰出的，也是最重要的之一。对他们而言，《中国季刊》仍然是一本“必读刊物”。与此同时，大量英语学术刊物在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涌现出来。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统计<sup>②</sup>，此类刊物有58种之多，涉及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话题[包括在中国(含中国台湾)发行的期刊和其他出版物]。除《中国季刊》，这些期刊中最有分量、最受尊敬的还有澳大利亚出版的《中国研究》(*China Journal*)、美国出版的《当代中国》(*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以及荷兰出版的《国情导报》(*China Information*)。

## 八、改革开放以来英国高校的中国研究<sup>③</sup>

过去的30多年中，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推动下，英国高校和学术界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迅速拓展。一些今天在中国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大学的中国研究系科已有多年历史。例如，谢菲尔德大学，早在1963年就建立了相关机构，目前已发展成为东亚研究系。其他大学里的院系也往往将对中国和中文的学术兴趣与研究同对日本、朝鲜、韩国的研究结合起来，这里就

---

① 参见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8, No. 2, 26 January 2006, 可从互联网下载。

② 参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网站。

③ 有关英国大学开设中国研究课程的相关信息均来自这些大学的网站及英国汉学协会(BACS)网站。

无需赘述了。谢菲尔德大学是目前比较标准的“双学位”模式的先行者，同时开设东亚语言和相应国家“当代研究”课程。因与同处在东北英格兰的近邻利兹大学——另一所在东亚研究领域颇具渊源的大学——共同建立了白玫瑰东亚中心的缘故，谢菲尔德大学近期加大了开展中国研究的力度。该中心由英国中国研究所和英国日本研究所组成，它的建立突出体现了英国高等教育界为推动中国研究而做出的重要和迅速的努力。同年，英国高校中国研究联合中心的建立进一步彰显了这一努力。该中心联合了三所英国一流大学的力量——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旨在将其教学与科研条件提高到凭借各校自身力量难以达到的水平。虽然如前文所述，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东亚研究系）。更不用说剑桥大学通过自己强大的东亚研究系将中国研究的传统完好地传承下来。同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也扩大了对中国研究的投入，于1992年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

所有开设中文和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大学都是1976年成立的英国汉学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成员。该协会在协调有关高校中国研究科研和教学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协会举办年会和定期研讨会，促进了该领域内的研究与合作的开展。英国汉学会的机构成员不仅包括上述院校，还包括一些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中积极参与中国研究并与中国高校建立了教学与科研合作关系的大学，例如杜伦大学和兰卡斯特大学。前者于1999年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后者近年来与多所中国一流大学全面开展教学研究合作与学生交流。兰卡斯特大学的中国管理中心在这些合作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较年轻的英国大学也在中国研究的教学与科研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1999年建立了中国中心的北安普顿大学和在与千禧年起始之际建立了当代中国中心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然而，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后来居上者并非哪所新建的大学，而是“红砖大学”中最古老的诺丁汉大学。诺丁汉大学在对研究突然迸发出热情并从英中两国获得可观的政府或私人资助后，于2006年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院和中国政策研究所，此外还在中国浙江宁波市建立了一个校区。

## 九、当前英国高校中国研究的质量与数量

在过去 20 年中，英国政府通过其代理机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EFCE)，定期评估英国高校系统内包括“亚洲研究”在内的所有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最近一次评估 [称为研究评估考核 (RAE)] 是在 2008 年。所有参与评估的大学都必须提交一份学者名单，而这些学者在评估周期内至少要发表 4 篇产生了学术影响的文章。此外，参与评估的研究所的研究环境也需接受 HEFCE 组织的同行评议。根据评估小组对“亚洲研究”的报告，与此前的预料一致，中国研究领域研究者的数量实现了增长，这主要归功于曼彻斯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相关学科的扩张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学和北安普顿大学规模较小的研究机构得以保留。然而，在研究人员数量增加的情况下，提供研究成果的大学的数目反而有所下降。只有 10 所大学提供了相关（包括亚洲研究及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研究）研究成果。提供成果的大学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利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北安普顿大学，其中前三所院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数量就占了一半多。这三所大学在总体研究质量方面也位居前三。<sup>①</sup>

## 十、英国大学和中学的中文及相关教学

上述大学都开设汉语和 / 或与中国相关学科的学位课程。事实上，根据英国汉学协会的资料，目前英国有 22 所大学提供有关中国的学位课程，还有更多大学提供研究生课程和攻读博士的机会。这些大学大约占英国同类院校的

---

<sup>①</sup> 参见 2008 年研究评估考核东亚研究组的报告，参见研究评估考核 (RAE) 网站。

1/5，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大学也有那些新建的大学。此外，有关中国研究教学的拓展还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学将普通话列入普通中等教育证书（16岁以上）和通用教育证书（高级）的考试科目中。此类学校的数目从2003年的70所增加到2008年的500所左右。然而，2010年英国只有100名接受过完整培训的普通话教师。面对这一情况，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在2010年宣布英国专长学校联合会（The Specialist Schools and Academies Trust）和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学院总部）将进行新的合作，目标是在2015年前培养1000名新的普通话教师。由此可见，目前英国大学和中学的中文教学，较之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发展都更为迅速。

## 十一、迅速发展的孔子学院

目前，英国大学设立了近20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为中文和其他与中国相关的教学提供资金支持。其中3所设立于位于伦敦的高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伦敦南岸大学。后者专门从事传统中国医学的教学和研究。一部分孔子学院附属于更古老、拥有悠久中国研究传统的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诺丁汉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利物浦大学，另一部分则附属于更年轻（至少在中国研究方面）的院校，包括伦敦南岸大学、中央兰开夏大学、卡迪夫大学和威尔士大学三一圣大卫学院。这些院校举办的活动形式多样、特点各异，但都包括教授中文、为学生和当地民众提供更多了解当代中国的机会。英国文化委员会向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推广英国的语言和文化，而在许多方面，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语言文化方面扮演了同样的角色。鉴于英国大学近年来遭遇的财政危机，孔子学院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本身为这些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总之，正如人们或许已经认识到的，对中国、中国人及其经济、社会、文

化、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在英国的不断发展是与中国在当今世界实力和重要性的增强同步前行的。对英国学府里的学生而言，今天的中国不容忽视，中国研究也是如此。